

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

<http://www.criifs.org.cn> 2008年10月14日 贺水金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解放全中国及百废待兴,导致人民币财政性发行和生产性发行双向推进,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剧烈波动。政府采取临时应急与长效治理相结合,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齐下,金融、财政政策同时跟进,标本兼治的方略,全力平抑物价,在短时间内成功治理了持续达13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顽症,为人民生活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创造了经济奇迹。认真研究和总结新中国反通货膨胀的经验,对于当前有效抑制CPI节节攀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价波动;治理通货膨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承国民党统治后期恶性通货膨胀之余波,以及解放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开支浩大,收入甚少,国家财政收支失衡,赤字庞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之弥补,通货膨胀状况依然十分严重,涨风不断,物价剧烈波动,投机活动猖獗,给战后经济重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党和人民政府果断采取措施,通过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齐下,标本兼治,至1950年3月基本制止了自抗日战争以来连续13年通货膨胀的局面,物价进入基本稳定阶段。之后又经历了朝鲜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等考验,到1952年底,全国物价已由基本稳定进入全面稳定。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是一个奇迹,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新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三大战役”。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问题,目前尚无人进行专题研究,但这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资料,除了1958年出版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外,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联合汇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商业卷和工业卷。此外还有《陈云文选》及大量的文件汇编、报纸报道、社论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素材。本文在大量研读档案资料及主持财经工作当时人的各类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仔细耙梳,尽可能勾勒出建国初期通货膨胀的全景图,并进行一定的分析,以期能对当局有效抑制CPI节节攀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 建国初期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剧烈波动

(一) 建国初期四次物价涨风

建国初期物价波动最剧烈的是1949年—1950年3月,先后发生了四次大的物价涨风。

1. 第一次涨风。1949年华北发生严重的春旱,春粮短收,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平津等地。在4、5两月,上述地区物价普遍上涨50%左右。政府通过抛售物

资、取缔投机、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很快阻止了涨风的继续蔓延。

2. 第二次涨风。这次物价风潮发生在上海解放后不久。首先由银元投机开始，继而向粮食、棉纱等主要商品进袭，带动上海物价直线上升。从1949年5月17日到6月9日的13天中，总指数上涨217倍以上，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米上涨2.24倍，纱上涨1.49倍。①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几被黄金、银元所排挤。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首先采取大量抛售银元的办法，平抑银价。6月5日，政府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售银元10万枚，但如同泥牛入海，银元价格继续上涨。6月10日，政府坚决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了一批投机分子，分别予以惩处，给投机势力予以沉重打击。同时公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和私相买卖，或以金银、外币计价。人民银行开始挂牌收兑金银外币。翌日，上海银元的价格从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米价也随之下跌10%。6月14日起，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上述措施，基本上取缔了金银投机活动，人民币通货地位得以在上海市场初步确立，整个物价也获得了短时期的稳定。继上海市打击银元投机活动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7家地下钱庄及扰乱金融市场的街头兑换店。各大城市的这一打击行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史称“银元风潮”或“银元之战”。

但上海物价仅仅稳定了2周，便再起波澜。从6月23日—7月21日近1个月内，纱价由32.5万元上涨至61.5万元，上涨89%；粮食上涨更猛，从6月23日至7月16日，米价由每石11700元涨至59000元，上涨404%。整个物价上涨幅度均很大，7月物价指数上升204.61，比6月份涨104.6，各种主要商品7月平均价格比6月上升50—200%以上。②平津物价也急速抬升，物价风潮如野火般骤然蔓延到全国。

针对这一涨风，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管理市场物价的新措施，如制定各种交易规则、对几种主要商品禁业场外交易、统一交易时间、规定现款当日交割、禁止栈单买卖、禁止兼做业外生意、实行议价等，以限制私商的投机活动。同时加紧调集物资，国营贸易单位加大抛售力度，大米抛售量逐步增加，由占市场成交总量的5%上升至55%以上，价格均低于市价，并对工人和机关团体实行物资配售。在这些措施下，7月下旬的物价涨势趋于缓和。

3. 第三次涨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物价涨势最猛，波及范围最广，局面最紧张，延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全国性物价涨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从10月15日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首先是进口工业原料如五金、化工等价格节节上升，接着纱布、粮食价格大幅度跳升，推动整个物价猛涨，每天上涨10%到30%，人民币币值狂跌。以7月物价为基础，到12月10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4大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3.2倍，11月24日达到物价波动的最高点，为7月底的3.7倍。③

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战斗在反通货膨胀第一线的陈云注意到，上海投机者主要囤积纱布，华北投机势力集中冲击粮食。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首先集中精力应对北方粮价稳定问题，从11月15日起每日由东北运粮1000—1200万斤入关，供应京津地区。同时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这些手段震慑了投机者，安定了民心。

从京津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开始全力抑制上海的物价涨势。起初由上海国营贸易单位在市场大量抛售物资。从10月10日至11月10日的一个月中，抛售的棉纱共2万件，棉布共30万匹，加上粮食、食糖等物资，全月收回的通货达300余亿元。大米的抛售量更大，11月7日一天，抛售91.1万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量的10倍以上。但这样多的物资抛售仍无法遏制物价继续上升，如11月16日，国营公司虽以

每石75, 000元至80, 000元的平价, 抛售大米750万斤, 而私营米店零售价, 每石仍高达14—16万元。

① 其二是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 集中抛售。由于这次涨风是全国性的, 仅上海一地行动已不能解决问题, 迫切需要全国统一部署。中央及时在全国各大城市调集了主要物资, 于11月25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 集中抛售。为了给投机商人以适当教训, 中央特别指示: 第一, 在当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 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第二, “等到收缩银根与物价平稳, 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 我乘机买进。”②除了大量调运、抛售物资外, 还配合税收、信贷等多种手段, 使投机资本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中财委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 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 私营工厂不准关门, 且须照发工人工资; 加紧征税, 不得迟交。同时, 全国各地严加取缔地下钱庄, 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11月25日全国统一抛售行动开始, 起初投机商仍然大量扒进, 甚至不惜举债买货, 但从当天起物价不仅稳定, 而且稳中有降, 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外。在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 投机商们再也坚持不住了, 只能纷纷贱价求售, 物价由此下跌达30—40%。这时, 持续了50天的物价涨风, 在中央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下, 终于获得全面地制止。这就是著名的“米棉之战”。

经过多次涨风, 1949年全年物价升幅很大, 石家庄、张家口、北京、郑州、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杭州、上海13个城市批发物价的综合指数统计, 计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 上升达73.84倍。最高如石家庄, 上涨达8514倍, 较低的如郑州也上升65.83倍。天津以3月为基期, 到年底物价上升了35.18倍。③

4. 第四次涨风。1950年春节前后, 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 电厂遭到严重破坏, 工厂停工, 春节前消费品供应趋紧等, 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又一次物价风波, 带动全国物价上涨。全国15个大中城市25种商品批发物价指数, 如以1949年12月为100, 到1950年1月升至126.6, 2月升为203.3, 到3月则上涨为226.3。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和粮食全国大调运, 迅速稳定了物价,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就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物价涨风。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这时除西藏外, 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 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 工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1950年3月, 陈云为政务院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统一了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 财经部门整理收支, 缩小赤字, 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 这就为物价走向全面稳定奠定了基础。13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局面, 由此被根本扭转, 这一次物价涨风, 成为十余年来中国物价持续波动的尾声。

(二) 物价由基本稳定进入全面稳定

1950年3月至1952年12月, 中国物价基本结束了抗日战争以来物价长期波动的局面, 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及人民生活安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1951年前, 物价水平仍处于缓步上升之中, 及至1952年物价才逐步趋向下降, 进入全面稳定阶段。

第四次物价涨风被抑制, 特别是中央统一财经及紧缩通货的措施贯彻执行后, 社会上投机囤积的商品大批出笼, 竞相脱货求现, 市场缺乏买主, 商品成交量日益萎缩, 物价立即由停止上涨转为全面下降, 3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仅涨619%, 4月下降1616%, 5月继续下降314%。中小城市的物价较上海下降更大, 一度形成销地价低于产地价、售价低于成本、市价低于牌价、零售价低于批发价等物价倒

挂现象。货币流通速度随之减慢,根据上海私营行庄票据交换的次数计算,过去每月流通30—45次,3月减至15次,4月更减至不足4次。① 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意味着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这是通货膨胀将得到根本治理的前兆。

十多年来所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人们“非但停止了预购行为,并且发生了延迟购买趋向”,②由重物轻币逐渐变为重币轻物,突出表现在银行存款余额显著增加,从4月1日至15日半个月,工商业存款增加了2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的折实储蓄单位,户数减少了27%,折实单位份数减少了36%,而同期人民币存储户数增加了28%,存款金额增加了29%,并出现有人存6个月以上的长期存款,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久未有过的现象。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新中国巩固前期平抑物价成果,彻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朝鲜战争爆发及10月25日我国派出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部分进口工业原料来源困难,价格大幅上涨。如烧碱上涨81.8%,黑铁坯上涨112.6%,安尼林纳上涨1667%。如以11月平均价格和10月比较,上涨更大,二硝基上涨172.6%,烧碱上涨92.3%,橡胶上涨105.6%。11月工业器材类指数,比6月涨87.1%,总指数亦涨31.8%。8—11月总指数月上涨率平均在5%左右。随着工业原料品价格的上升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其他物价也开始不稳,11月连续发生白煤、漂白粉、玻璃等商品抢购风潮,价格被哄抬至1倍以上。③ 纱布供应亦极度紧张。已进入基本稳定的物价局面,几乎有引起新的全面波动的危险。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汇率、贸易管制,大力开展对苏联、捷克、波兰和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国家对工农业产品的收购数量,进一步提高国营贸易控制国内主要商品物资力量;冻结资金、加强现金管理;取缔投机,打击囤积居奇等。由于上述各种措施及时、正确、有力,保证了物价总趋势的稳定。12月批发物价指数,开始转为下降1.3%,粮食、纱布、杂项等主要商品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工业器材类上升趋势也有所缓和,部分进口物资价格出现下降。

1950年物价走势,以3月最高,6月最低,全年物价较上年12月仅涨77.4%,物价已由1949年剧烈波动转向基本稳定。1951年物价总的趋势也是基本稳定,但仍有局部上涨、和缓上涨。当时除了进口物资比较紧张、价格上涨较快外,左右市场物价的商品,仍然是粮食和纱布。粮食由于1950、1951年连获丰收,国内交通运输陆续恢复,各地物资调运交流更为畅通,以及国家加紧公粮征收和收购,国营公司存粮充足,足以保证市场供应,因此粮价稳定。粮价稳,人心定,这是物价基本稳定的保证。但棉纱生产大部分仍控制在私营企业手里,加上农业丰收、农村土地改革取得成效、农村购买力提高,市场棉纱不足的情况因此显得非常突出,价格趋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棉纱的黑市价格超过牌价20%左右,青岛、济南等地甚至超过牌价达50%以上。为了巩固市场物价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于1951年1月4日公布了“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公、私营纱厂自纺自织棉纱及自织棉布,均须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对棉纱商、棉布厂、印染厂及针织复制等业用纱,按合理手续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一分配供应。国营公司根据照顾自纺自织、代纺代织的原则,制订了统购价格,同时对棉纺工缴,适当予以提高。棉纱统购决定执行后,棉纱价格基本上摆脱了自由市场的支配,棉布价格亦得到了控制。

1951年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各地基本建设逐步展开,建筑材料、五金器材等需求旺盛。抗美援朝开始后,军事订货、后勤临时采购数量增大。军需民用竞购物资,引起工业品价格发生新的波动。五金、建材及日用百货出现普遍上涨,1951年建筑材料上涨率达8219%,个别工业器材甚至被抬价至10倍。④ 为此,中央贸易部及时发出了《坚决稳定物价》的指示,反对惜售思想,大力出售各种

商品,对市场暂时供不应求的商品,加强产销的计划性,进行调剂与分配;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有计划地调整物价;不断扩大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贸易往来;开展“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战争也不断取得胜利,1952年中国物价在上半年出现全面降低,下半年进入全面稳定。1952年12月上海、天津、沈阳、汉口、重庆、西安、广州七大城市52种主要商品的批发价格指数比1951年12月下降6.4%。其中,食品类价格除了谷类之外下降15%,燃料、工业装备和原材料下降13%,棉纱和棉布下降1%,建筑材料下降9%。上海批发物价指数1952年较上年下降6.6%,全年逐月平均波幅为-0.6%,^①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所没有的现象,标志着中国物价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走上了全面稳定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反通货膨胀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言以蔽之,建国初期通货膨胀是十分严重的。因通货膨胀,物价持续大幅度上涨,人民币币值狂贬,购买力急剧下降。对此,陈云曾仔细计算过,他说: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1950年初,共发4万1千亿元。依当时的物价计算,相当于214亿斤小米。但因为贬值,1年后只值49亿斤小米,换言之,在“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8亿2千5百万银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②可见,1949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速率是十分惊人的。兹以上海物价为例,与战前作一比较,见下表。

表1 1937年以来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历年上涨倍数

时 期 批发物价指数上涨倍数

1937年7月至1941年底 13.5倍

1942年 3.0倍

1943年 4.8倍

1944年 11.6倍

1945年8月止 34.0倍

1946年 7.7倍

1947年 14.7倍

1948年8月止 56.0倍

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 5072000.0倍

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 20.0倍

资料来源:《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72页。

由上表可知,撇开1948年8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及最后走向崩溃这一阶段,物价上涨5,072,000倍外,上海解放后物价指数的整体涨幅并不低,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各阶段,仅次于解放战争时期上涨倍数最大的1945年,较1946、1947年都大。这既有国民党统治后期恶

性通货膨胀惯性之延续,也有新生的共和国军事、经济因素引发财政艰窘所致,是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由无序走向有序过渡时期所必须付出的某种代价。问题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治理通货膨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民心,巩固政权的重要保证。

二 建国初期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 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巨大,纸币发行过量

建国初期物价连续上涨且涨幅惊人,虽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庞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资弥补。

1948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迅速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就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①党和人民政府对一切不愿抵抗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军政人员数量剧增,加上解放区已有的军政公教人员约计900余万人,全部由国家供养,财政包袱沉重。随着解放地区的日益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日益增加。连年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战争的创伤急待医治,交通运输急需恢复,工矿生产急需重建,众多失业人口亟待救济,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财政支出猛增,而财政收入却所增有限。老解放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解放初期“还在以很大数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支援前线和新解放城市”,^②负担过重,已难以复加;新解放区正常的税收工作还来不及建立和开展,国营企业受到严重破坏,正待恢复,所交利税甚少。加上因历史原因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分散管理,收入大部分由地方掌握、分配。由此造成国家财政收支严重脱节,开支大大超过收入。1949年,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303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567亿斤,赤字264亿斤,赤字占总支出的46.56%。关内财政赤字更高达占全部支出的65.97%,换言之,一半以上中央财政支出只能通过发行货币解决。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到1949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

表2 1949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单位:粮亿斤

地区 收入 支出 赤字 赤字占支出%

东北 172 182 10 5.5

华东 71 192 121 63.02

华北 28 78 50 64.1

中南 22 77 55 71.4

西北 8 31 23 74.2

西南 2 7 5 71.4

合计 303 567 264 46.56

资料来源:《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ZE 01—5。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

注：对赤字占支出的百分比已根据实际数据进行了修订。

上表显示，东北因战争结束，财政赤字很小。关内各区，由于战争规模浩大，财政赤字均在60%以上。剔除东北，其他各区全部收入为131 亿斤，支出为385 亿斤，赤字254 亿斤，占总支出的65.97%。

③

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适当增加一部分人民币的财政发行；为了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也需要发行人民币为生产建设融资。人民币的财政性和生产性双重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

国家采取增发钞票以应付各种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广(巨)大的财政赤字。”④陈云分析道：通货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以及筹措工业投资和农产品收购费用。经过反复利弊权衡后，他认为，这些开支不能少，因为“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农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①

对于货币过量发行引发物价跳升，中央高层领导洞如明烛，宋劭文很坚定地说：“物价上涨问题，基本上是由于票子发得多。”②陈云也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③在分析1949年10月发生的全国最大的一次涨风时他认为：此次币跌物涨，除部分地区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纱销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贵等外，“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7月底发行量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底为11000亿元，到11月12日增至16000亿元，“发行增加近5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④

（二）物资严重匮乏，社会有效供给不足

10余年战争蹂躏使国民经济惨遭破坏，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劫逃了大量物资，更加重了物资匮乏程度。

据统计，战争中工业破坏的程度，电力工业为50%，钢铁工业达90%。⑤ 农业大幅度减产，1931—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年产2844.6亿斤，抗日战争时期降为2390亿斤，减少15%，1949年再降为2254.8亿斤，较抗战前减少约21%。⑥ 全国所有的铁路、公路在解放时几乎无一线一段能通车。由于战争使各地处于分割状态，大大影响了全国物资间的有效调运和流通。至于解放前夕国民党劫逃物资，仅上海估计约值6亿美元。此外，工商企业资金和物资亦有大量南逃。解放初期，上海接管的米只够全市半个月消费，煤只够1周消费，私营纱厂的存棉264,000担，只够维持1个月生产。其他各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存底均很枯薄。上海工商业已整个陷入瘫痪状态，工业生产已大部停顿。全市各电力公司的发电量，已从20万千瓦左右减至7万千瓦左右，多数工厂停工减产，解放初期工业生产开工率仅为正常时期的20%左右。1949年7月下旬，据原上海市工业协会对86个行业的调查，13824厂中，开工者4457厂，占32.24%，停工者9367家，占67.76%，开工者中开工率高的不过40—50%，低的仅20—30%。⑦ 总之国民党留给人民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在烂摊子上重建，需借以时日。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前，因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物价上涨在所难免。

（三）帝国主义封锁、轰炸及农业歉收，使新生的共和国经济雪上加霜

解放后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还多次对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经济中心上海进行轰炸，电力设施、工厂设备遭到损坏，进口设备、原材料来源发生困难，影响企业顺利恢复生产，增加了物资供应不足的程度。1949年灾害频仍，春天北方发生严重旱灾，夏秋各地又发生程度不同的冰雹、水灾和淮河决堤。全国共有12000万亩耕地、4000万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天灾加上长年兵匪骚扰，灾区普遍缺粮、缺种、缺牛，无法恢复生产，导致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⑧粮价因此数度激升，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导因。如10、11月的物价涨风，便发轫于华北缺粮地区，继而波及全国物价。

（四）人民币尚不能完全占领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

解放初期，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老百姓仍习惯于银元或物物交换，因此人民币流通范围并没有随解放区的扩大而同比例地扩大。面向内地及农村发行的人民币，很快回流城市，汇成游资，冲击物价，人民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成倍增大，也助长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程度。

（五）投机操纵，加剧了物价波动

12年通货膨胀所养成的重物轻币心理和投机风气，短时间内还难以改变，一旦市场稍有风吹草动，投机者便兴风作浪，加剧了物价波动程度。建国初期，由于国营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尚未能完全掌握，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家财政收支很难平衡，各种物资严重短缺，投机者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工业原料、纱布、粮食等主要商品抢购套购，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如在1949年10月涨风中，上海市工商局查出一家投机纱号，仅10月10日一天，就非法拆款囤购棉纱达89件，以高抛低吸手段，短期内赚取暴利近棉纱80件；在11月涨风中，米商以每石6—7万元的价格从国营粮食公司买进粮食，又以每石15万元的价格零售给市民，抬价1倍以上。11月7日国营粮食公司在市场上抛售大米高达58795石，为平时交易量的10倍，根本不是实销，完全是投机者套购所为；又如在第三次涨风中，某些进口原料，上涨3—4倍甚至近10倍，和工业品价格倒挂，显系投机哄抬所致。投机囤积风炽，人为制造了很多虚假的购买力和社会需求，往往大于实际消费的数倍，使本已匮乏的物资更加短缺。因投机操纵，哄抬价格，进一步助长了物价上扬。

三 建国初期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举措及成效评析

针对建国初期通货急剧膨胀，物价大幅度波动，政府采取了临时应急与长效治理相结合，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齐下，金融、财政政策同时跟进，标本兼治的策略与措施，全力平抑物价，治理通货膨胀顽症，为人民生活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平抑短期物价涨风的主要举措

1. 点、面结合，抛售物资

如前所述，建国初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物资严重匮乏，纸币发行过量，“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加上投机资本推波助澜，掀起了一次又一物价风潮。急症需用急药治，主要和常规手段是抛售物资。在1949—1952年4次涨风中，都运用了这一手段，抛售的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紧缺物资

“两白一黑”，即粮食、棉纱和煤炭。个别时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领涨商品，也有抛售银元、五金器材等。这是点面结合的第一个层面。

点面结合的第二个层面是以上海为主，兼顾天津、武汉、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与上海遥相呼应，收指臂之效；特殊时期又实行上海集中抛售与全国统一行动相结合。中央反通货膨胀政策实行重点突破的策略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刚刚解放，战争还在局部地区继续，生产尚未恢复，政府所掌握的物资有限，与投机势力斗法，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因此上海解放后，政府控制物价的主战场转移到上海。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经济呈非均衡性发展，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基地，上海的物价对全国居于领导地位，各地唯上海马首是瞻，通常上海物价一涨，全国物价跟着上跳。据此，中央将平抑物价的重点放在上海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通过控制上海的物价来影响、带动全国物价走稳。上海解放后，政府从各地调运了大量物资，通过大规模集中抛售，使剧烈波动的上海金融物价得以暂时稳定，但上海也由此一度成为全国物价的洼地，如纱布价格，杭州、济南、汉口等地均大大高于上海；米价，甚至周边产区无锡、松江、嘉兴等地也高于上海10—30%。^①于是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商品，导致1949年10月后上海物价出现猛烈上涨。上海物价一动，又刺激各地物价继续上涨，上海物价和各地物价，形成相互刺激上涨的局面，最后演变为波及全国的最大一次涨风。中央通过调集物资，全国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及金融、财税政策紧密配合，才平抑了这次涨风。

在不断地实践摸索中，政府逐渐积累了经验，根据所掌握的物资丰欠程度，进行区别对待，灵活运用。“手中实物充足力量雄厚的商品”，粮、布、煤、盐、糖等，市场价格一有波动，“采取坚定不移的稳定方针”；即坚决大量出售以资平抑达到稳定”。对新粮登市，如市价低于牌价，则坚决大量收购；如市价稍高于牌价，则适当吞吐，保持市价与牌价的平衡；如市价超过牌价5%以上，即坚决大量出售平抑。在局部地区，政府“掌握力量很不充足的个别商品”，如棉纱、煤油、工业器材及其他进口物资，则“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上提价格，以避免后力不继，造成物价波动”，特别是棉纱，在出售时，“采取集中使用力量，稳定主要市场的办法，将力量摆在主要市场上出售；对中小市场，暂时停止在市场供纱。”^①

2. 取缔投机，紧缩银根

在掌握时机抛售物资的同时，政府同时出台各种加强金融管理与市场管理的措施，以增强政策执行的力度和实施的效果。如规定在有纱布、棉花、粮食等交易所的地方，必须集中成交，场外交易为违法。严格禁止非纱布厂商经营纱布，违者实行重罚。严格取缔投机、囤积居奇及哄抬物价，对严重违法投机的行庄和工商企业，进行惩处。责成银行，严格执行紧缩银根的政策，并要求贸易、财政、税收等部门予以密切配合，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物价方针等等。如在1949年11月25日开始全国统一行动，集中抛售物资过程中，中财委同时出台了紧缩银根、催交税收等措施，使投机资本无回旋余地，不得不竞相贬价求售，亏损累累，受到沉重打击。严格取缔囤积居奇，打击投机势力，旨在将社会中虚假需求泡沫尽量挤压，以缩小供需缺口。

3. 短期通货紧缩的利斧：冻结存款

这是一项紧急措施，一经使用，立竿见影。陈云提出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我们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这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②这一政策工具曾在1949年10、11月全国最大物价涨风发生时使用过。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金融出现波动，1950年11月4日晚，

中财委发布《关于冻结现金和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指出：解决当前困难，“放在面前的办法，只有两个：其一，大、小公家在银行的存款暂时定期地冻结，贸易公司暂时缓收、少收农、土产。其二，发行六万亿至七万亿元新钞（即增加发行一倍），但当此人心浮动时，物价金融必乱一倍有余，于政治、经济的影响都极坏。两害相权，我们决采第一项办法，即冻结存款，缓购农产。”③但冻结存款这种急剧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威力巨大，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因此陈云对冻结存款的措施十分审慎，“非到危机时决不轻用”。④

4. 特殊情况，特殊措施：部分紧缺物资采取统购统销及配售禁卖办法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全国物价再次出现不稳定的状况。中财委及时下达了《关于防止物价波动问题的指示》，“如遇有特殊情况到来时”，将启动特殊措施，对物资缺乏又与人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商品，采取统购统销及配售禁卖办法，以避免物价大波动，并增加财政收入，帮助平衡财政预算。主要准备实行：纱布统购及配售；工业器材配售；将部分内销及进出口战略物资与紧缺商品，如煤油、汽油、羊毛、油脂、糖等纳入统销范围。⑤

政府采用上述治标之策，对抑制局部地区局部时段物价上涨作用显著，但正如陈云所言：“那种稳定是暂时的”，“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⑥因为军政费用仍在逐月增加，财政赤字仍在逐月增长，纸币仍在继续发行。所以要想使物价真正稳定，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还有待于治本之策的推出与实施。

（二）战胜通货膨胀的治本之策：平衡财政收支，减少货币发行

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巨大，主要靠发行人民币以之弥补。因此从本源着手，唯有努力平衡财政收支，减少赤字发行，才能彻底治理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有三种途径：发行货币，增加税收和募集公债。既然决定尽量少发或不发货币，只能取后面二途。

1. 增加税收

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加税收就能减小财政赤字，降低因赤字带来的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物价。在国家财政困难时期，增税与发行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陈云坚决主张：“在多收税少发钞票和少收税多发钞票二者之间，必须选择多收税少发钞票的办法。”他分析说：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的危害要小。虽然会增加工商业负担，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经营有好处。反之，如果物价波动很大，就不会有人投资经营工业，资金或囤积物资，或闲置家中，很多人会因此失业，“这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得社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①

当时的税收主要有农业税、关税、盐税、工商税等。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农民的税负过高。为了增加税收，政府通过平衡农村税收和城市税收，提高工商税比率，减轻农民负担；厘订和统一税制、税率，健全税收制度；简化征收手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偷税漏税；加强税收机关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质量，抓紧催收等着力整顿税收，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1950年后税收有了显著增加，并逐年递增。1950年公粮收入占总收入25.71%，各项税收占30.3%，②两项合计达56.01%。1951年税收总额713,596亿元旧人民币，占总收入的49.45%，1952年各项税收总额升至930,468亿元旧人民币，③较上年增加30.4%。1951年后由于国营企业收入等大幅度上升，税收在总收入中的比率有所下降，但稳定在国家财

政总收入的约50%左右,而绝对税额更是大幅攀升。税收约占总收入一半,这就为财政赤字缩小以及实现全面平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募集公债

发行公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又一重要途径,可以起到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等作用。它是治理通货膨胀十分有效的手段。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规定第1期发行1亿分,每分含实物为大米3公斤,面粉0.75公斤,白细布1.33米,煤炭8公斤。年息5厘,分5年偿还,公债的发行和偿还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1949年12月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指出发行公债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赤字,减少现钞发行,有计划地回笼货币,使物价逐渐稳定,以保证各阶层人民安定生活工商业正常发展。”原定于1950年发行2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二期发行,第一期发行1亿分,第二期因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停止发行。1950年发行公债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93%^④虽然胜利公债提供的政府收益有限,但正如方显廷所评价的,其“阻挡通货膨胀的效用则是颇为巨大的”,公债发行的初始效应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心理,从而导致物价的稳定。^⑤

3. 统一国家财经管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平衡国家财政收支、抑止物价波动、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一项关键性举措就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管理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完全分散管理,各自发行货币,各自管理财政收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各地财经工作依然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但国家财政主要支出如军事费用、经济建设投资、救济费用等完全由中央负担,而主要收入公粮、税收等却仍留在省、市、县政府手中。中央财政没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入不敷出,只能依赖发行货币应对各类开支,由此导致通货膨胀,物价剧烈波动。而全社会物资严重不足,只有集中使用,统一调度,统一投放,才能打击投机,平抑物价。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初,除西藏外,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解放,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已停止,这就为实现财经统一,争取财政收支平衡提供了可能。鉴此,由陈云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于1950年3月3日颁布实行,基本精神是:“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统一管理,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内容包括:(一)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并予以核实,消灭虚报数字。制止各机关不经批准自行添招人员,各部门各企业如需增添人员,经批准后,必先向全国编制委员会请求调配;(二)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仓库存货,无隐瞒地逐级转报,不得打埋伏,不得擅自转移。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三)厉行节约。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四)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五)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六)统一全国贸易。各地国营贸易机构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得干预。一切部队、机关不得自行经商。(七)一切公营企业(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均须按时纳税,均须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八)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九)对军队及地方经费的现金支付,应按照编制的确有人数,按月按季地批准各部队各部门的预

算,按期支付现金。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① 这一决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由分散管理进入基本上统一管理时期。

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第一,在编制上消灭了“空额”,缩减了大批人员。仅西南地区,部队消灭空额10多万人,地方上消灭空额也在2万以上。由此大大减少了无谓的浪费,紧缩了财政开支。② 第二,清出了大批物资,对克服财经困难起了一定作用。1950年清理仓库收入占财政总收入1.05%。③ 第三,物价和金融出现稳定新局面。第四,财政收支由接近平衡变为完全平衡。1950年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实施后,国家财力、税收、金融资源等集中度得到提高,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逐季缩小,第一季度赤字为43%,第二季度为40% (包括使用公债款在内),第三季度降为9.8% 第四季度降为6.4%。全年赤字仅6.79%。1951年因抗美援朝,赤字微升至7.19%,国家发行10万亿元旧人民币,弥补赤字。④ 因国家财政收支开始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而市场物价逐步达到了平稳。至1952年完全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物价因而出现了持续全面稳定的局面。

(三) 努力恢复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

建国初期发生通货膨胀还由于社会物资匮乏,供需出现严重缺口。因此除了增加税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减少货币发行外,还必须尽快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扩大社会有效供给,这是物价全面稳定的物质基础。

1. 加快交通设施修复和建设,保证货畅其流

国家对恢复交通运输工作高度重视,截止到1952年10月1日,在3年的时间内,修复铁路线超过1万公里,新建铁路1255公里,两项合计有23785公里的铁路线已投入运营。公路被修复32438公里,新建11000公里。① 大量公路、铁路的被修复和新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加上全国解放,和平环境的缔造,各地货物运输更为便捷,有助于加快物资流动,促进城乡交流,调剂各地盈缺。货畅其流,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增加市场物资供应量。

2. 兴修水利,为农业丰收、增产创造条件

粮食供应充裕是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的前提。水利建设是农业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保障。陈云说:“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过去减少。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② 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包括:(1)对经常发生水灾的主要河流进行治理,修筑堤坝,如1950年启动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后将造福27万平方公里土地、近6000万人民;(2)开挖水渠,修复、改进排灌系统,到1953年9月,灌溉区域已扩充了约4600万亩;(3)疏浚河流,建立多座为农业服务的水力发电站等。水利工程的兴修加上良好的气候条件,新中国洪涝灾害得到了有效控制,受灾面积逐年减少。1949年水灾泛滥范围超过1亿亩土地,1950年受灾土地减为6000万亩,1951年再减为2100万亩,1952年降至只有1600万亩。③ 通过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了保障,为粮食丰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50、1951年农业连续获得大丰收。

3. 集中财力,保证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工业投资只能有重点地进行。陈云说:“一个家庭收入的分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要把“财力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

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有计划、有控制地投资建设一些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项目,使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发展。后来我国“一五”时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集中有限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是合理使用财政收入,迅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

经过3年多的努力,我国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快地恢复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以1949年全国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为100,3年来几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如下:

表3 1949—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表

品 种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	-------	-------	-------	-------

生 铁	100	394	575	768
-----	-----	-----	-----	-----

钢	100	383	566	850
---	-----	-----	-----	-----

钢压延品	100	299	571	921
------	-----	-----	-----	-----

电	100	106	134	168
---	-----	-----	-----	-----

原 煤	100	132	164	205
-----	-----	-----	-----	-----

原 油	100	166	251	358
-----	-----	-----	-----	-----

水 泥	100	213	376	433
-----	-----	-----	-----	-----

金属切削机床	100	209	370	705
--------	-----	-----	-----	-----

棉 纱	100	134	149	200
-----	-----	-----	-----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报1950、1951、1952年。

国民经济的日益恢复与发展,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资日益充裕,社会有效供给不断扩大,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为物价的全面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 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人民币占领全国市场

1. 统一全国货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确立币信的过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即收兑了各解放区货币冀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统一了关内货币。1951年又在国家财政实现基本平衡,人民币币值稳定,并经受住了朝鲜战争的考验后,于4月1日起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0月1日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至此,除西藏以外,人民币已在全国流通,成为唯一合法的通货。

2. 促进人民币下乡

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税收，规定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收取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完全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箭齐发”，银元基本退出了农村市场，物物交易的比重也大大缩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管理以前，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及至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约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①

人民币有效占领了全国市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市场，由于农村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上农民素有储藏现金的习惯，大大减缓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使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成倍缩小，这也是1950年3月后全国物价能走向稳定的货币因素。

此外，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开展折实储蓄与保本保值储蓄等措施，对回笼货币，稳定币值也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处理外国在华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0.7%，占工业总产值的41.3%，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的92%，钢的97%，机器及机器零件生产的48%，水泥的68%，棉纱的49%。^②另外，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业，以及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尤其重要的是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后，国营贸易公司掌握了大批物资，除在市场无限制供售外，还加强了零售组织，逐渐确立了在市场的领导地位，中国经济也将逐渐步入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经济依然没有过去，各种凭证票据就是最好的注释，通货膨胀以隐性的方式显现，但人民的生活是安定的，社会是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普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深受其害，70年代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又纷纷陷入“滞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实行价格改革为止，物价一直保持稳定，成为凸显于战后通胀年代保持价格稳定的少数几个“绿洲”之一。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可以作各种评价，也可以有争议、有批评、有反思，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治理了持续13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顽症，我们不得不叹服。

四 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平抑剧烈波动的物价，成功治理通货膨胀？

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又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历史启示？

（一）政治稳定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尚有局部战争，但1950年初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结束，军费开支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与解放前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深陷战争泥潭，军费支出急如星火，只能不断印钞来解决，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和平环境的缔造弥足珍贵。

（二）治本之策：努力平衡财政收支，紧把印钞机闸门

1950年和平秩序的恢复，也为一度因军费开支巨大，收支严重失衡，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之弥补

的财政经济出现根本性改观迎来了新的曙光。3月通过统一国家财经工作,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逐季缩减,至第三季度末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全年仅赤字6.79%。为弥补赤字而进行的财政性通货发行,已基本停止。1951、1952年,因抗美援朝,国防开支有所上升,1951年占总支出的45.64%,1952年政府尽力使之降低到32.23%。①在抗美援朝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努力将国防建设费用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工农业生产次第恢复,税收和国营企业收入持续增加,因此国家财政并没有出现恶化,1951年赤字7.19%,由少量发行弥补。1952年,国家财政收支不但完全平衡,还出现结余30万亿元以上,印钞机闸门由此关上,人民币币值迅速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根本治理。

(三)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综合治理通货膨胀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财政、经济、货币政策配套运用,再辅之于适当的市场管制与行政干预,形成“合力共振”,收到综合治理之效。在全社会物资严重不足,通货膨胀预期较大,投机气氛较浓之时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强大而有效的行政干预,一方面可以将社会中虚假的需求挤出市场,另一方面可以打击投机势力,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四) 巩固通货膨胀治理成果的“利器”——土地改革

新中国于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1952年9月底,约有7亿亩土地或者说全部耕地的一半重新分配给农民,并免除他们原来须向地主缴纳的地租,该项地租折合粮食计5000万吨,相当于1952年粮食总产量的1/3。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很快恢复和发展,与土地改革不无关系。粮价稳,物价稳。粮食供应充足是保证市场平稳的核心,尤其是在饱尝了长年战争苦难之后,生存是第一要义。农业丰收增产,成为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利器”。

文章来源: 史林 (责任编辑: XL)